

《山左金石志》纂修者述论

——兼对“毕沅、阮元同撰”的辨正

孟凡港

摘要：《山左金石志》虽题为毕沅、阮元同撰，实乃阮元及其幕友朱文藻、何元锡、武亿、段松苓和赵魏所修，毕沅仅参与了《山左金石志》编纂条例的商订以及提供自己所藏彝器、钱币、印章、拓片等金石资料而已，纂修工作由阮元组织完成。

关键词：《山左金石志》；毕沅；阮元；幕友

中图分类号：K204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2)04-0017-04

《山左金石志》24卷，是清代乾嘉时期优秀的金石学著作之一，首次较为系统地将山东古代的金石资料汇辑于一编，并加以考释。关于此书的纂修者，似乎并无异议，因为《清史稿·艺文二》、《清朝续文献通考·经籍考十二》与《书目答问·史部》均称：“《山左金石志》二十四卷，毕沅、阮元同撰”，且嘉庆二年小琅嬛仙馆刻本完整保存于世，并明白地标注了纂修者为毕沅与阮元。而事实上，该书主要由阮元及其幕友们编纂而成，并非毕沅。那么，毕沅与《山左金石志》有何关系？阮元的哪些幕友参与了该书的编纂？本文主要对这些问题予以考察。

一、毕沅、阮元与《山左金石志》

毕沅（1730—1797）字秋帆，江苏镇洋（今江苏太仓）人。乾隆二十五年进士，先后任翰林院修撰、翰林院侍读学士、太子左庶子、甘肃巩秦阶道员、安肃道员、陕西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、陕西巡抚、河南巡抚、湖广总督、山东巡抚等职。他精于经史、金石，著有《续资治通鉴》、《关中金石记》与《中州金石记》等。

阮元（1764—1849）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江苏扬州人，通籍仪征^①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进士，历官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任职地方学政、督抚，充兵部、礼部、户部侍郎，拜体仁阁大学士，在清

代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。阮元身为达官而不废学问，在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、文学、历算、书画等领域造诣深厚，著述宏富，纂修有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、《经籍纂诂》、《皇清经解》、《山左金石志》、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、《两浙金石志》、《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》、《畴人考》、《广东通志》、《两浙輶轩录》等，成为扬州学派的领军人物。正如《清史稿》所称：“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，主持风会数十年，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。”^②

关于毕沅、阮元与《山左金石志》的关系，我们可以通过阮元的《山左金石志序》来考察：

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，奉命视学山左，首谒阙里，观乾隆钦颁周器及鼎、币、戈、尺诸古金，又摩挲两汉石刻，移亭长府门卒二石人于甕相圃。次登泰岱，观唐摩崖碑，得从臣衔名及宋赵德甫诸题名。次过济宁学，观戟门诸碑及黄小松司马易所得汉祠石象，归而始有勒成一书之志。五十九年，毕秋帆先生奉命巡抚山东。先是，先生抚陕西、河南时，曾修《关中》、《中州》金石二志，元欲以山左之志属之先生，先生曰：“吾老矣，且政繁，精力不及此，愿学使者为之也。”元曰：“诺。”先生遂检《关中》、《中州》二志付元，且为商定条例暨搜访诸事。元于学署池上署积古斋，列志乘图籍，案而求之，得诸拓本千三百余件，较之《关中》、《中州》多至三倍，实始为修书之举。而秋帆先生复奉命总督两湖，继且综湖南北军务矣。元在山左卷牍之暇，即事考览……六十年冬，草稿斯定，元复奉命视学两浙，舟车余暇，重为厘订……是时，

^①（清）阮元《研经室二集》卷2《扬州北湖小志序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本》第2201册，中华书局1985年，第367页。

收稿日期：2011-09-04

作者简介：孟凡港（1979—），河北平乡人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，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、中国文化史研究。

^②（民国）赵尔巽《清史稿》卷364《阮元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第11424页。

秋帆先生方督师转饷，戮逆抚降，寒暑劳勩，婴疾已深，虽有伏波据鞍之志，实致武侯食少之虞，竟以七月三日卒于辰州。元以是书本与先生商订分纂，先生莅楚虽羽檄纷驰，而邮筒往复指证颇多。^①

由以上史料可知，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秋，阮元出任山东学政，首谒孔子故里曲阜，观看乾隆钦颁周器及鼎、币、戈、尺诸古金，又摩挲了两汉石刻，再登岱山，观唐摩崖碑题名，又到济宁府学，观戟门诸碑及汉祠石像，回到府城济南后便产生了纂修《山左金石志》的想法。正巧第二年，湖广总督毕沅被贬为山东巡抚，二位江苏同乡性情、志向相投，于金石均情有独钟。因毕沅先前巡抚陕西、河南时曾编纂《关中金石志》和《中州金石志》二书，故阮元以山左之志托付毕沅。二贤同心赞成此举，遂商榷条例，博稽群籍，荟萃山东十一府、两州之碑碣拓片，又各出所藏彝器、钱币、官私印章，汇而编之。事实上，毕沅由于年老体衰，且政务繁忙，精力不济，编纂任务由阮元独力承当。不久，该年秋天，毕沅再授湖广总督，离开济南。阮元于公事之暇，咨访耆旧，广为搜寻，继续纂修《山左金石志》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秋，阮元调任浙江学政，携草稿南下，舟车之暇，加以审核厘订。该年冬天，草稿初定。次年秋，书成。

我们不妨再看一下钱大昕的《山左金石志序》：

乾隆癸丑秋，今阁学仪征阮公芸台奉命视学山左，公务之暇，谘访耆旧，广为搜索。其明年冬，毕尚书来抚齐鲁，两贤同心，赞成此举，遂商榷条例，博稽载籍，萃十一府、两州之碑碣，又各出所藏彝器、钱币、官私印章，汇而编之。……秋帆移督三楚，讨论修饰润色，壹出于公。乙卯秋，公移节两浙，携其稿南来，手自删订。嘉庆丙辰秋，书成，凡廿四卷。^②

钱序同样亦表明了《山左金石志》由阮元纂修而成。细究《山左金石志》的成书始末，无论是纂修想法的萌生、纂修事宜的提出，还是金石资料的搜集整理、书稿的纂写、删订、润色以及最后成书并刊刻，均由阮元负责完成。此外，在《山左金石志》的行文中，到处流露出阮元作为主纂者的口气，如卷三《汉朝正殿瓦二器》，“右铜瓦二，元得之于济南市中”；又如卷九《中书令郑羲碑》，“元尝亲至崖间摩挲”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认定《山左金石志》的纂修者是阮元，而非毕沅。当然，我们不可否认毕沅对《山左金石志》的成书起到一定的作用：其“检《关中》、《中州》二志付元，且为商定条例暨搜访诸事”，并提供其所藏彝器、钱币、官私印章，即使其调至湖广总督任后，仍“邮筒往

复指证颇多”。即便如此，仍不能改变阮元实乃纂修者之实，《山左金石志》之所以题上毕沅的名字，或许是阮元出于对最初约定的信守以及对毕沅所发挥价值的尊重。

二、《山左金石志》的参纂者

阮元督学山东期间，于公事之暇，遍访齐鲁金石文物，并广交山东及寓居山东的金石学家，如段松苓、桂馥、颜崇榘、黄易、武亿等。然而，由于阮氏政务繁忙，精力不济，所以延请幕友协助完成编纂之事，正如其在《山左金石志序》中所言：“元以山左卷牍之暇，即事考览，引仁和朱朗斋文藻、钱塘何梦华元锡、偃师武虚谷亿、益都段赤亭松苓为助。……六十年冬，草稿斯定，元复奉命视学两浙，舟车校试余闲，重为厘订，更属仁和赵晋斋魏校勘”。由此可知，参与《山左金石志》纂修、校订的阮氏幕友主要有：朱文藻、何元锡、武亿、段松苓和赵魏。

（一）朱文藻

朱文藻（1735—1806），字映滢，号朗斋，浙江仁和人（今杭州）人。他学识渊博，既精六书，又通史学，“自《说文系传》、《佩觿》、《汉简》及《钟鼎款识》、《博古图》诸书，无不贯串源流，会其旨要。”^③朱氏“留心文献，好金石”^④，自著《碑录》两卷。钱塘黄易招他游山左，时阮元、孙星衍同任职山东，与之商订拓本甚富。朱文藻佐助阮元纂修《山左金石志》，多次外出搜访金石，如在嘉祥县洪山顶上寻得《姜三校洪山顶题字》、《程伯常洪山顶题名》、《洪山石佛题名》、《洪山诗刻残石》等石刻^⑤，均收录在《山左金石志》中。对于访得的碑记铭文，他还予以考释。如《玉清宫诗刻》，“在潍县玉清宫，……朗斋考为李道元所作。”^⑥又如，《太真观残碑》，“该碑只存上半截，凡二十一行，字径一寸，朱朗斋云：碑文有‘大朝启祚’之语，知为元初之碑，又碑末以摄提格纪岁，知是寅年，以意揣之，当为甲寅。”^⑦

（二）何元锡

何元锡（1766—1829），字梦华，又字敬祉，号蜨隐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监生，候选县主簿。他笃志古学，富有收藏，嗜金石成癖，“尝病狂，友人约赠以汉碑，乃服药而愈。”^⑧何元锡久居曲阜，

①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·阮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09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68页。

②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·钱序》，第367页。

③（清）王昶著、周维德校辑《蒲褐山房诗话》卷上《朱文藻》，齐鲁书社，1988年，第152页。

④（清）阮元《定香亭笔谈》卷2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602册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56页。

⑤分别见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卷17、18、20、24，第10、29、72、158页。

⑥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卷23，第135页。

⑦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卷21，第88页。

⑧（清）潘衍桐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卷24，浙江书局光绪十七

后入阮元幕，协助阮氏纂修《山左金石志》。他
不畏劳苦，经常于幽山峻岭中搜访金石，阮元曾称赞
其云：“钱塘何梦华元锡，博洽工诗文，尤嗜金石，
藏弃最富。年逾弱冠，交游遍海内。与黄小松司马
同乡，尤深金石之契，山左碑版，半为二君所搜得。
最后于孔林外得《永寿残碑》，又于《史晨碑》下
截得数十字，及《鲁相碑阴》、《竹叶碑》正面，
皆旧拓所未见者。”^①《永寿残碑》即《永寿元年孔
君墓碑》，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何元锡于曲阜孔林
外偶得，阮元赋诗《何梦华林外得碑图》云：“孔
林墙外夕阳明，永寿碑酬访古情。我后何君来曲阜，
手摩残字得熹平。”^②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冬，何
梦华洗涤孔庙诸碑，在对《鲁相碑》与《竹叶碑》
清洗后仔细辨读时，发现《鲁相后碑》比旧拓本多
出六字，碑侧剔出唐人题名凡四行：“门人徐泗节
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杜兼童子高簣
大唐贞元七年辛未春二月八日”^③。而《竹叶碑》亦
多出数字，阮元云：“右碑（指《竹叶碑》，笔者
注）向来只见碑阴题名二列，乾隆己酉冬，何梦华
洗石精拓，始知阳面有字七行，漫漶殊甚，惟首行
第七字是‘之’，二行第六字是‘祖’，三行第二
字是‘造’，余皆不可辨矣。”^④又如《唐玄宗纪泰
山铭后刻诸王群臣题名》，“凡四列，字径一寸四
分，有方界格，皆为明人加刻。大字横贯交错，遂
使湮毁无传，无有过而问者。何梦华佐余修《山左
金石志》时，就空隙处，细为辨出，补图记之。”^⑤

（三）武亿

武亿（1745—1799）字虚谷，一字小石，自
号半石山人，又号授堂，河南偃师人。据孙星衍
所撰《武亿传》记载：武亿自幼不苟嬉戏，八九
岁，“以朱墨点定明代名人制义，第其高下”，父
亲甚为惊喜。年十二，遍览九经诸子，为文下笔千
言。由于早失怙恃，生活困苦，但读书格外刻苦。
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中进士，乾隆五十六年
（1791）谒选，授山东博山县知县。莅任期间，秉
公守法，勤政爱民，革除诸多供馈陋习，后因得罪
权贵而遭罢官。此后，游于东昌（今山东聊城）、
临清，主讲清源书院，凡五载，始返河南故里，以
修县志终其身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，卒于邓州客馆^⑥。

武亿博洽于学，贯通经籍，“生平深于经史，

七经注疏、三史、《涑水通鉴》，皆能暗诵”^⑦。阮
元对其评价道：“生平著述甚多，皆阐抉经术，搜
索原本，不喜为词章，而词章亦尔雅醇厚，如其为
人。尤精于金石学，尝佐予裒辑《山左金石志》”。
^⑧武亿尤精于金石之学，喜好收藏碑版，游历所至，
“如嵩山泰岱，遇有石刻，扞苔剔藓，尽心摸拓；
或不能施毡椎者，必手录一本。”他听说偃师杏园
庄民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，急往购之，墓志长二尺
有余，重几百斤，武亿肩扛步行四十余里以归^⑨，其
嗜金石如此。武亿在《金石三跋序》中，叙述了其
搜访金石的经历，并抒发了对金石学的深厚情意：

亿往在京师，尝因童时所好金石遗文，益
为收募。其间，出资力售而置之者，十不二三
焉。时历荒崖废墟、人迹之所不至，数往返，
以手为寻拓者，反十之四五。又从而间关致于
四方，复有通博深奇之士，不惮千里见遗以成
其好者，亦有一二。故以其致之为甚劳，而得
之又艰且远，则愈益珍秘。自十余年来，穷逐
四出授徒，于远僻孤寂无人之乡，汗漫独游，
冒犯江湖湍激汹涌不测之危，无不携置行篋度
藏，失所检覈不能猝及于目，辄废寝食，皇皇
以索之，盖其积习之癖如此。……其为前人已
著录无所推阐，及推阐而有谬误，不能不为之
订其疏者，始见于篇。若自为搜获，则虽其事
之限于穷讨不及，亦无所遗弃，资后人之所考
焉。然则予之拳拳于斯，日惫其心力，以掇古
人之得失为可惜，而古人之迹不见史，而见予
之录者，固幸有存也。故为之道其所以，以俟
览者有以知予之志也。^⑩

武亿在金石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，著有《安
阳金石录》12卷、《偃师金石记》4卷、《偃师金
石遗文补录》2卷、《郟县金石志》1卷、《宝丰金
石志》5卷、《鲁山金石志》3卷、《金石三跋》10
卷、《金石文字续跋》14卷等^⑪。武亿罢官后，曾
佐助阮元纂修《山左金石志》，提供自己摹拓的金
石资料和所著金石跋文。如《大明禅院钟识》，在
东昌府治，为武亿主讲启文书院时所拓^⑫。又如乾隆
五十八年（1793），江程香在新泰张孙庄得到《晋
任城太守孙夫人碑》，武亿对它考证极为精详，载
入《山左金石志》卷8《晋任城太守孙夫人碑》跋
中。

（四）段松苓

年刻本。

- ①（清）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卷2，《丛书集成初编本》第
2599册，中华书局1985年，第42页。
②（清）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卷2，第43页。
③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卷8，第488页。
④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卷8，第488页。
⑤（清）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卷3，第92-93页。
⑥（清）孙星衍《芳茂山人文集》第11《五松园文稿·武亿
传》，湖南思贤书局光绪二十年刻本。

- ⑦（清）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卷4《武亿传》，中华书
局，1983年，第70页。
⑧（清）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卷1，第24页。
⑨（清）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卷4，第70-71页。
⑩（清）王昶《湖海文传》卷29《金石三跋序》，经训堂道
光十七年刻本。
⑪（民国）赵尔巽《清史稿》卷146，第4317、4319页。
⑫（清）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卷3，第422页。

段松苓(1745—1800),字劲伯,亦字赤亭,青州益都(今山东青州)人。段松苓早失怙恃,故“事祖母及继母,兼措拄内外事”。闲暇之余,博涉群书,研究学问,尤其酷爱金石,“得一碑为前人所未录者,自携毡墨,手打以归,时事姓氏,日夜钩考,必疏通证明而后已。”^①段松苓收藏了大量珍贵的金石资料,受到当时名人学士的赞赏,大兴翁方纲督学山东,搜访石刻,“青州一府得之松苓者为多”。^②段松苓在金石学领域著述颇多,著有《益都金石记》、《赤亭金石跋》、《山左碑目》、《山左古金志》^③等。

乾隆五十九年(1794)二月,阮元延请段松苓“入督学幕中”^④,佐其搜探金石资料、纂修《山左金石志》。该年五月,“先生(指阮元,笔者注)命其访碑于各峰镇”^⑤,段松苓跋山涉水、风餐露宿,“或舂粮而行,架岩涸水出之,椎脱捆载以归,虽曰山左古迹之多,亦求者之勤,有以致之也。”^⑥《益都金石记》卷首有武亿所作序文,记述了段松苓搜集、整理金石资料的过程:

今岁春二月,山东督学使者仪征阮公编录此方金石遗文,属益都段君赤亭为之搜探。君既任其事,由泰安抵济宁,又折而南至于临朐、沂镇,往返千有余里。所至披榛棘,携拓工,手拓数百纸,及获前人所未及收者又数十本,攀致以归。已而,自出平日所辑乡邦遗刻,录有成书,上之阮公。公悉命采摭,不没其实。^⑦

由上面序文可知,乾隆五十九年(1794)二月,阮元嘱托段松苓为之搜探金石遗文。五月,段氏便由泰安至济宁,再折至潍坊、临沂,往返千有余里,拓纸数百张,所获资料甚丰,其中不乏很多前人著述未收录者。回到住所后,将之与平日所辑金石资料汇编成书,交付阮元,阮元悉命采摭,编入《山左金石志》之中。

阮元获悉明铁太保铉守济南、抗击朱棣靖难之兵一事,旧说太保守历下时,忽有群僧助战,乃是沂山五百石罗汉。于是,阮元嘱托段松苓入沂山访碑,“遂拓得石佛造象(像)记以归,应真名赞,历历可考,皆天禧、乾兴、天圣年间所造。”^⑧再如,“益都云门山阳石洞,有隋开皇、仁寿年间造像十四种;长清五峰山莲华洞,亦有隋时造像三十种,

皆段赤亭于乾隆乙卯春亲至其地搜得之,从无著录者。”^⑨总之,《山左金石志》的纂修,段松苓功不可没。后来,阮元曾对段松苓评价道:“博洽多闻,淹通经史,著有《益都金石志》,考证精核。予尝谓东州宿学,无过此人,修辑《山左金石志》时,引之为助。”^⑩

(五) 赵魏

赵魏(1746—1825),字晋斋,号藁森,一号洛生,仁和(今杭州)人。他少嗜金石之学,中年游关中入毕沅幕,后归杭州入阮元幕,佐助校订《山左金石志》。正如阮元《山左金石志序》所云:“(乾隆)六十年冬,草稿斯定,元复奉命视学两浙,舟车余闲,重为厘订,更属仁和赵晋斋魏校勘”^⑪。他在金石学领域造诣深厚,家藏碑版极多,“所藏商周彝器款识、汉唐碑本,为海内第一。”^⑫阮元对其评价极高:“博学精于隶古,尤嗜金石文字,欧赵著录不是过也。”^⑬清人钱泳更是称其“精于金石文字,今之赵明诚也。”^⑭赵魏的金石著述较多,自著有《竹崦盒碑目》、《华山石刻表》、《竹崦盒金石录》、《御史台精舍碑题名》、《郎官石柱题名》等,并参与《山左金石志》的校订及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、《两浙金石志》与《金石萃编》的编订。赵魏一生不隐不仕,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金石的搜集与研究上。清人梅曾亮赋诗《赠赵晋斋》云:“先生不隐亦不仕,坦然世路忘崎岖。古心独抱汉阴瓮,天眼能窥汲冢书。尝惜浮云同变幻,时从缺月辨模糊。青鞋布屐访碑处,试将余意问邱墟。”^⑮张廷济亦赋诗云:“石刻三千卷,人知竹崦盒。寒毡穷不易,敝帚老逾贪。宝佑桥终住,先秦器自探。丁溪船惯泊,题字勒花南。”^⑯这是对其人生经历、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。

三、结 语

总之,《山左金石志》虽题为毕沅、阮元同撰,实乃阮元及其幕友所修。书虽成于众家之手,然皆经阮元复勘而后定其是非。由于阮元及其幕友在金石学领域造诣深厚,使得《山左金石志》体例整饬,内容丰富,考证精详,质量上乘,成为清代优秀的金石学著作之一,对乾嘉之际山东金石学的兴盛做出巨大贡献。

(责任编辑:黄云鹤)

①(清)法伟堂《益都县图志》卷39《儒学传·段松苓》,光绪三十三年刻本。

②(清)法伟堂《益都县图志》卷39。

③(清)法伟堂《益都县图志》卷25。

④(清)法伟堂《益都县图志》卷39。

⑤(清)张鉴等撰、黄爱平点校《阮元年谱》卷1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3页。

⑥(清)阮元《山左金石志·阮序》,第369页。

⑦(清)法伟堂《益都县图志》卷25。

⑧(清)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卷1,第19页。

⑨(清)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卷3,第89页。

⑩(清)阮元《小沧浪笔谈》卷4,第117页。

⑪(清)阮元《山左金石志·阮序》,第369页。

⑫(清)潘衍桐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卷29《赵魏》,浙江书局光绪十七年刻本。

⑬(清)阮元《定香亭笔谈》卷2,第56页。

⑭(清)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6《耆旧·晋斋文学》,中华书局,1979年,第170页。

⑮(清)梅曾亮《柏树山房全集·诗集》卷2,第1230页。

⑯(清)张廷济《桂馨堂集·感逝诗》,第774页。